

深层次改革应着力调整经济结构

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一般性改革向深层次改革迈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质的突破,既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

王勇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笔者认为,总理的报告求真务实,中国深层次改革应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完成了许多改革,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一般性改革向深层次改革迈进。日前,世行行长佐利克提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6条建议,旨在帮助中国吸取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的教训,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这6条建议条条都指向深层次改革,而这些深层次改革却都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流动性好转还将延续

陈伟

根据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2月末,M2同比增长13.0%,比上月末高0.6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4.3%,比上月末高1.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央行逐渐放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流动性已经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我们预计,3月新增信贷有望出现明显改善,从而支持流动性继续好转。

3月是季末,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传统2009年信贷增加过猛外,商业银行加大存款的吸储力度普遍都会使得存贷比指标改善,这将有利于提高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

从贷款需求来看,也会有所改观,如2月后在商业银行落实居民首套房贷款政策后,各地的房市销量都出现了回升,可以预期,3月后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将会出现明显回升;而3月两会后,在中央要求落实“十二五”新开工项目的政策精神以及银监会有条件放松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指导下,各地加紧开工项目将会增大中长期信贷需求。

更重要的是,央行担心的短期通胀已经减轻,如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3.2%,比上月大幅度下降1.1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甚至低于往年春节在1月的情形,二季度CPI还会继续回落至3%以下,这意味着央行还有空间继续放松货币政策。

由此我们预期,3月信贷同比增速

有关。中国2010年人均GDP就已经超过4000美元,进而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近些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特征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一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四是在发展中对外部世界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等。

经济结构需要调整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各地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突出,加之欧美债务危机阴云未散、国

仍有望小幅增加至15.5%左右,而M2增速有望继续提高,而受益于3月后企业需求逐渐回暖带来的企业去库存加快,M1增速也有望持续提高。

当然,鉴于以下因素,我们认为,今年流动性增速提高的空间也会十分有限。

如受制于去年以来金融脱媒、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趋势的影响,当前居民的人民币存款增速将会十分有限,这也将很大程度上制约银行的放贷力度;在传统信贷大户部门:地方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部门仍受政府总体调控背景下,市场主体的贷款需求也会受到抑制;我国不断追求的外贸平衡也使得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逐渐减少,人民币升值的空间也将减弱,这将会驱动市场主体更多地配置外币资产,如去年我国外汇存款增速为19%,第一次超过本币存款,而今年前2个月,外汇存款更是呈现38.7%的高增长,这将决定今后我国外汇存款对于流动性的贡献将越来越小。

央行已经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现实,主动下调了货币信贷增速,如今年M2增速14%的目标小于过去稳健货币政策实施期间的16%,这意味着即使央行出于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的需要稍微放松货币信贷增速控制,但也不会过度激励银行放贷,任由流动性走向泛滥,这些因素都决定上半年信贷增速最高将不会超过16%。

内消费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结构性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如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加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化水平不高、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影响了内需扩大和发展空间的拓展;资源消耗偏高加大了环境压力和资源约束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质的突破,既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

多方面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笔者建议,我们应着力就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多作思考和研究。

首先,应淡化经济增长速度而强化经济增长质量。“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今后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7%。温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GDP增长7.5%。这是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8年来首次低于8%。这一预期目标的调低,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其次,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扩大技改专项资金规模、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更要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机制,加强统筹规划、项目配套、政策引导,扩大国内需求,制止太阳能、风电等产业盲目扩张。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等产业。

其三,采取多项政策措施,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方式来调节贫富差距的过大,增大顶层收入者的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反补给底层的民众;把国有企业的收益让利于民,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中,真正地老百姓谋福利;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及生存需要;要多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四,破除垄断,有效改善中国的“经济体质”。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基础上,还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

另外,要进一步优化中国的金融结构。在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在金融结构优化上应采取“上小下稳大型”、“上民营稳国有”的策略,建立国有和民营两类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着力培育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还要提高利率、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水平。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统筹境内外金融市场发展,分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构筑坚实的金融市场基础,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

焦点评论

国债期货渐行渐近



赵乃育/图 孙勇/诗

国债期货酝酿推,仿真交易很正规。过往失败留教训,未来成功靠准备。期现结合能对冲,双轮驱动好接轨。债市创新且深化,服务实业更到位。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后福岛时代:核电何去何从

彭一郎

3月10日,全国政协新能源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称,中国将有望在今年重启核电站项目的审批。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智民则透露,目前重新修订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没有完成,但目标肯定比2007年的规划更远大,已审批完的项目装机容量超过4000万千瓦。

中国核电审批将重启的消息,在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一周年祭的特别时刻,重新引发公众的关注。核电站建设到底安不安全?在清洁能源和安全风险之间该如何权衡?

核电安全备受争议

福岛核事故之后一年,欧美国家逐步弃核电,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已经承诺缩减或结束本国的核计划。作为全球核能强国的法国,今年5月总统选举的领先候选人也誓言将对核能的依赖减

少三分之一,而当前法国75%的发电量来自于核电。

日本作为核事故的中心,目前54座反应堆仅有两座仍在运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大地震一周年纪念发布会上说,日本从福岛核事故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核电安全没有神话,今后政府要制定全新的、最高水平的核电安全规范。话中表达了对核电安全的高度警戒。《华尔街日报》则在报道中提问,如果像日本这样科技发达的国家都阻止不了核灾难,那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怎么阻止得了?

当然也有许多相反的声音,中国国家核电重大专项委员会委员、中广核集团原安全总监濮继龙在微博访谈中表示,世界核电的发展高峰期,美国曾经最多一年有55台机组同时在建,法国最多一年有32台机组在建。目前,这些机组运行了几十年都是安全的。福岛事故不是知识经验不足的问题,也不是安全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执行力的问题,日本核能界和政府在处理事故中存在侥幸心理。濮继龙认为核电是极其安

全的,发展核电是理智的选择。

许多专家以航空业举例,飞机是当前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坠机事故,不能因为一两起意外事故而抛弃航空业的发展。人类众多科学技术的运用都是一把双刃剑,而其是否值得推广,取决于对风险(包括伦理道德风险)和收益的权衡。

公开透明发展核能

与天然气、石油等常规能源相比,核能除了略有价格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其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极小;对比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核能不受气候等外部环境影响,供能稳定。同时,核电生产的碳排放量最低,从环保角度来看,核电更适合作为未来工业发展能源。中国核工业专家李宁说,人们算来算去,然后意识到没有核能是不行的。

中国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加大核能发展,还有着更现实的原因。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下,劳动密集、能源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比如铝和玻璃的生产就是能耗大户,能源紧缺矛盾突出。

面对这种风险与收益的权衡,王炳华表示,福岛事故之后,国家对核能安全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目前为止检查工作已经结束,共计发现14方面的问题需要整改,已有部分整改完成,其他亟待整改。他表示,所有准备在建的项目,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范围、产业指导政策内,也完全符合国际和国内核安全相应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一边是发生几率极低但具有毁灭性的风险,一边是核能为人类带来的莫大益处。诚然,核能的取舍不仅在今天,在很远的未来也还将备受争议,不同国家会做不同的抉择。但确定的一点是,任何一个政府在扩张核能时,都应当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包括:一、最大限度的提高核能发电的安全性;二、在核电设施建造时,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让更多的受到核电站安全威胁的民众知晓更多的信息;三、为安全事故做足应对措施;四、寻找探索其他更安全的新能源。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打击恶炒新股 抓住了“牛鼻子”

李允峰

最近,沪深交易所分别对恶炒新股出重拳。3月7日,深交所祭出打击新股炒作“紧手钢”,对新股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制度进行调整。深交所发布的《关于完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制度的通知》主要包括:新股盘中成交价较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10%;盘中换手率达到或超过50%。3月8日,上交所也出台类似规定,只不过把换手停牌标准提高到80%。

恶炒新股是A股市场多年来形成的顽症,深交所此次出重拳打击,其力度之猛,其制度之严都是前所未有的。炒新的资金看重的往往就是新股上市当天过高的换手,以及可以当天建仓利用无价格上限限制疯狂拉升,如今按照深交所的新规,不仅新股换手50%要停牌,而且上涨幅度距离开盘价上涨10%也要停牌,况且在停牌后只留出退市前3分钟用来集合竞价,也让炒新资金缺少拉升时间,可谓是抓住了恶炒新股的“牛鼻子”,在今后深交所上市的新股,多数都要被停牌的可能。

但再完美的“药方”也有副作用,深交所的新《通知》客观上也造成了新股上市筹码供应量为减少,毕竟只要换手达到50%就要停牌,针对这一点,笔者建议取消网下配售股的锁定期,增加新股被恶炒和操纵的难度。

目前在新股发行中,对网下发行部分存在3个月的锁定期,毫无疑问,这同样在客观上造成新股上市首日流通数量较少,使得首日交易中机构投资者影响力大大降低,而投机盘成为主导力量,从而放大了新股的涨幅,因此,应取消网下配售锁定期,加大首日股票流通量可以同样能

够起到打击恶炒新股的作用。

在A股市场,新股成为“有毒资产”已经引起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在2月底,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股市顽症是“打新”。去年新股发行价平均是47倍的市盈率,比前年已经低了约20%,但还是老股价格的3倍以上。据报道,据上交所抽样计算,高位接手的中小投资者绝大多数人都会被套牢或“割肉”,上市首日买入新股的散户3个月内有56.7%亏损。由此可见,在根治“新股有毒”的市场现象时,除了在新股上市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重拳之外,从新股发行的源头上入手同样不能被忽视。

要保证新股发行价格的合理和真实性,提高机构的配售比例或许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按照A股的询价机制,上市公司公开发行数量在4亿股以下的,网下配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量的20%;公开发行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网下配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量的50%。但与国际市场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对较低的。在香港市场,向国际机构配售的比例通常在80%以上。如果能够将大比例的股份向询价对象进行配售不仅可以增加投资者合理报价的动力,而且可使新股IPO具有更合理的定价基础,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降低新股上市的首日收益率,从而减少新股恶炒现象的发生。

当然,IPO环节可逐步引入存量股份发行,也会从新股供应量的供求关系上遏制新股恶炒。存量发行一方面增加了发起人股东转让股份的途径,另一方面可以在发行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减少上市公司最终获得的募集资金量,降低过多募集资金为企业运营能力带来的压力。存量发行的最大好处是避免了新股上市之后带来的大量限售股对未来股价的冲击,这对于A股市场的长期稳定而言是最为需要的。

救助希腊无法解决欧债危机

王天龙

当私人部门参与希腊债务互换重组之后,欧盟将发放对希腊的第二笔救助资金。但笔者认为,希腊第二笔救助资金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债务重组计划尽管为希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不能解决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

救助希腊的计划要求希腊在2012年将财政赤字从9%降至4%,到2020年,把希腊的债务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0%。如果希腊做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不会为希腊继续融资。尽管希腊做了巨大的努力,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主要原因在于,救助方案的关键前提是希腊要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在失去了货币政策主权,财政政策又不得不进行严厉紧缩的背景下,希腊的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陆续调降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将变得愈加困难,更难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欧元区在解决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主要思路还是对问题国家进行救助,并且希望IMF或者其他国家均出钱救助。欧洲也建立了相应的救助基金,如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但是,救助的办法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如果债务危机出现蔓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再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话,即使EFSF扩容,也无法有效进行施救。

希望通过IMF和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来帮助解决欧债危机,也可以理解,毕竟欧债危机的解决现在需要在全世界范围来重塑对欧洲的信心,但实现这一意愿仍

存在不少困难。新兴经济体国家虽十分乐于看到欧洲的繁荣稳定,但在具体的援助细节和方案上,也都还存在顾虑。

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新兴经济体国家再次表达了有条件增资IMF的意见,即只有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合并,并扩充欧元区内部救助能力,才会向IMF进行增资。但即使IMF顺利进行了增资,从当前欧元区问题国家的风险敞口来看,IMF的救助资源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欧债危机进一步扩散,IMF到时也是无能为力。

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有复杂的内外部原因。有信心缺失、高福利制度难以维系等原因,但根本上则是欧元区内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未统一的制度缺陷。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也只能是从克服这一制度缺陷入手。

对希腊等欧元区的问题国家来说,必须通过建立外部增长引擎来实现经济发展,而这外部的增长引擎,只有实施全欧盟范围的投资计划才能实现。因此,应该着手研究发行欧元区债券(bonds)的各种技术问题,力争形成全球性的欧洲国债市场,以便降低欧元区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重塑投资信心,吸引新资本流向欧洲支持其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